

胡鞍钢·著



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时代已经来临

全世界都在搭中国崛起这趟车

正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失败，成为邓小平改革成功之母

腐败是最大的社会污染，它毒化了经济和商业环境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制度革命



世界对话

HUANGANG
YUSHIJIE DUIHUA

胡鞍钢 与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胡鞍钢：与世界对话

胡鞍钢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鞍钢：与世界对话/胡鞍钢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0. 4

ISBN 978 - 7 - 5473 - 0139 - 5

I. 胡… II. 胡… III. ①中国—概况—文集 ②公共政策—中国—文集 IV. D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034846 号

胡鞍钢：与世界对话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255 千

印 张：17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250 册

ISBN 978 - 7 - 5473 - 0139 - 5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中国进入制度创新的时代	/1
股份制应建立游戏规则	/11
中国改革方向：制度建设与国际接轨	/14
中国为何要加入世界贸易体系	/23
“九牛一毛”：中国普遍滋生的腐败现象	/27
中日两国必须合作	/31
谈国内外局势	/38
中国政府如何调控宏观经济	/50
国家财富：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61
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74
发展与变化中的中国和世界	/84
中国与世界共创繁荣	/97
谈中国“十一五”发展规划	/107
谈“东亚一体化”	/120
只有对外开放,才有巨大红利	/132
谈中国崛起	/142
中日两国携起手来共创未来	/149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154
中日共建“低碳文明”	/158

中国与世界二氧化碳减排同步	/169
中国如何扩大内需	/187
中美需要绿色发展、绿色合作、绿色革命	/192
世界最大规模的“新政”	/198
谈中国社会转型	/204
中国如何节能减排	/213
谈中国节能减排义务	/219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日宏观产业经济政策问题	/227
为何我主张公开承诺减排	/240
金融危机下的中美贸易分析	/248
中国 2015 年：GDP(PPP)超过美国	/257

中国进入制度创新的时代^①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进入世纪之交,中国如何才能保持稳定?

胡鞍钢答(以下简称“答”)：历史给了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一个艰巨的任务,即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国家与军队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等问题,进而确保中国长治久安。

其实,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健全制度的人,恰恰就是邓小平本人。1989年他对新成立的第三代领导班子做政治交代时曾说过:“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问：毛泽东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请问,邓小平给中国人民留下什么遗产?

答：首先要肯定的是,邓小平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他开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的开端,他所主张的改革、建设和开放,将引领中国走向21世纪,为建成世界经济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巨大财富。

此外,他也将给中国留下其他三大问题,就是空前臃肿的官僚机构、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和庞大的国家事业单位。因此,如何为官僚机构和事业

^① 本文系作者1995年5月17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张从兴访问的谈话整理稿,发表于《联合早报》1995年6月11日。

单位“消肿”以及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等问题,将成为第三代甚至第四代领导人的工作重点。

问：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之所以会越走越“左”,主要是激进主义在作祟,不知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答：我搞的是国情研究,曾经对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研究下了很大的功夫,为此翻阅了很多材料,包括史料。在我看来,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开始于1949年,而是开始于更早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搞了她自己的新政,并制定了海关法、银行法等法律条文。遗憾的是,我们一直要等到20世纪末才能有全国人大通过的另一部银行法。

在中国历史上激进主义往往是占上风的。结果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一种激进的政策、思潮、主义被证明行不通后,取而代之的却是另一种更加激进的政策、思潮、主义。这就回答了你所谈到的越走越“左”的问题。

其实,激进主义在经济上也是很有市场的。不仅毛泽东说过要“利用15年的时间,赶上英国”,后来的领导人也是急于求成的。在经济主张上,我是倾向于谨慎的乐观派,相对而言,也算是乐观派偏于保守吧。这里要说明一点,中国人老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保守派或保守主义。其实,在西方政治和经济术语中,保守派或保守主义并非都是贬义词。

我认为,中国人不能老是激进主义下去,急于求成,应该冷静地看问题,不要不切实际地谈理想,要注意中国的国情和局限。

问：我注意到您有一本书叫《挑战中国》。我想,在中国,谈经济永远离不开谈政治,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假如您能够在政治方面作一些论述的话,相信会对到中国投资的新加坡商家大有帮助。请问您能否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介绍一下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答：我今天正好把这本书带来了,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旨。它就是想说明中国政府现在遇到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但同时也存在丧失机遇的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短期的考虑是,如何能够通过制度建设,平稳地向新世纪过渡;长期考虑,就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我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期目的和

长期目的,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最重要的就是上面的五大关系,一个一个深入地进行分析,而且每一个关系,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国情报告中,是一本一本写出来的。这本书是由它们汇集在一起的,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讲法:第一代领导人,毛时代;第二代领导人,邓时代。这两个时代是政治强人的时代。那么,第三代领导人是什么时代呢?我们认为正是强人时代的结束,制度创新时代的开始。

如果中国能够制度化,中国就能够稳定;如果中国能够天下大治,中国就会再次出现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治。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建设来解决和消除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这是迫在眉睫的。如果您要再深入了解的话,可以读读这本书。

问:您谈到中国的腐败速度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因此主张以制度创新来根治腐败。据知,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没有完全根治腐败,也完成了经济建设任务,并将很快跻身发达国家或地区行列。

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使腐败的速度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不能完全根治的话,那么,您认为腐败问题应该处理到什么程度上,而中国的经济也能够起飞呢?

答:我想声明一下,所谓的腐败的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中国是有据可查的。

经济增长速度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每年百分之十左右。那么,腐败速度是怎么定义的呢?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数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还有海关、公安部、监察部等机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都不一样,但总的来看,稍对这两个数据(腐败案件的增加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做个比较,就可以得出我刚才的结论:腐败的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虽然,这次的王宝森事件以及陈希同下台事件,绝非偶然,相信都与此有关。当然,现在还没有真相大白,这里暂且不论。

中国的腐败越反越疯狂、愈演愈烈,可以说是涉及每一个投资者。因为,投资者要进入中国大陆,就需要贿赂。这无疑会增加每一个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我称之为腐败成本或贿赂成本。目前,中国大陆正处在一个很重要

的转型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程。这个过程，难免会伴随着一些“双轨制”，我们称之为转型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又是转型期的腐败的制度性根源。

这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制度性缺陷导致的，形成很大的“租金”。这种“租金”越高，寻租人的激励就越强，因此导致腐败愈演愈烈。

针对减少腐败乃至杜绝腐败的问题，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市场化改革，降低“租金”。譬如，现在我们的腐败，在金融业、土地批租业、房地产业、证券业等产业比较严重。恰恰这些产业的“租金”最高，激励很多人去寻租、去腐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就要通过市场化的过程，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譬如说，一个厂商到中国投资需要盖几十个章，那需要多少贿赂成本和时间呢？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降低“租金”，也就是要从制度上慢慢地来解决这个问题，譬如规定公布官员财产，领导人的财产、收入要透明化等。所谓透明化，不是指公布在《人民日报》上，而是专门的税务机构和银行机构能够掌握。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要公之于世。具体地说，还有一些做法如规定省部级以上的领导人在退休之后，不得经商。再者，就是严禁政治局委员，包括常委，国务院组成人员、人大副委员长，他们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经商。这样的话，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腐败是很难杜绝的。但是，我们不应以此作为发展的代价，或者把腐败作为经济成长的“润滑剂”。我们不能说，为了发展，就可以不惜牺牲，甚至以腐败为代价。

所以，我们希望减少腐败，减少“租金”，当然最终是要根治腐败。我想，只有解决腐败问题，中国大陆才有可能比较成功地、比较顺利地实现经济起飞。如果不能根绝，那么只有大上大下、大灾大难。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问：我有一个感想，还有一个小问题。您对中国的贪污腐败非常担心，但我的看法不一样。在印尼，贪污叫做“消费”；在马来西亚，贪污叫“Tahu Semua Tahu”(TST)，就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所以，如果把中国的贪污事件除以中国的人口，不见得太厉害。因为每个国家都走过这条路，美国一

样,日本也一样。

我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起飞当然有很多因素,但不知全世界的华人向中国注入资本,是不是其中一个原因呢?

答:您其实提了两个问题,我就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腐败,在中国是有争论的。1993年我刚回国不久,在广西北海市一个讨论会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大陆经济起飞的过程中,腐败不可避免。这就涉及两个不同观点:一种就是主张使腐败制度化;一种就是我的观点,反腐败制度化。

为什么我主张反腐败制度化呢?这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厂商,如果想提高办事效率,就得贿赂官员。贿赂官员都是偷偷摸摸的,不可能拿到桌面上。这样的话,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假设我是一个厂商,想注册登记一间公司,因此便贿赂一个官员,给了他500元,但是,另一个人却给了他1000元,结果他当然会为给1000元的那一个人服务,而不会替我办事。

久而久之,所有的厂商最后就会取得共识,认为今后要贿赂官员时,需要协商解决。协商解决就意味着使腐败制度化,就是你也出1000元,我也出1000元,你千万别出1001元。而且腐败本身有示范效果,因为你贿赂1000元,把事情办得很成功,那我同样会有榜样学习,另一个人也会跟着做。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就是中国的腐败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我担心的是,腐败将导致中国起飞中断。我们有历史的深刻教训,连邓小平都讲,“六·四”风波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我们腐败,我们如果不能反腐败,就会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而且这一类的语言,在《邓小平文选》中反复出现,讲了很多。这就说明类似“六·四”那样的风波,不是不会再发生的。这是我们对腐败问题采取的一个基本看法。

回答您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和俄罗斯比较起来看,显然中国经济的起飞,恰恰多了一个有力的因素,就是海外华人对中国投资的份额会越来越大。

问:关于减少贪污腐败的方法,新加坡有贪污调查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中国有没有可能成立各省级、地方或者中央调查局的审计制度,有没有可能成立行政独立的机构来反贪?

答：中国已经成立过审计署，审计规则也存在多年了。其实，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机构已经不少了，譬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司法部，等等。我约略算了一下，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

问题的核心，恐怕还不是机构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机构发挥什么样的反腐败职能，大多是治标不治本，事后处理腐败这一“社会毒瘤”。就是前面说的，要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就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这个问题。1995年2月，在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李鹏报告反腐败问题时，就谈到了“治标治本”相结合，并强调了治本的重要性。李光耀说：“政府少管事，就能少贪污。”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使现有的司法机构，包括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能够在现有政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使它们能够由上至下地“条条化”，而不是地方化，就是说检察长不应该由地方首长或者省委书记来任命和产生，而应该由直属中央机关来任命。

我想，司法的独立化将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同时新闻舆论应当允许报道这些事情，从而形成舆论制约。这些制约或多或少都会制约腐败现象。

问：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业，但我发现中国的教育水平，尤其是少数民族，总的来说是偏低的。我想知道胡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或者说，您是否会考虑在向中国当局提呈国情报告的时候，把教育问题也提上去。

答：我们进行中国人口问题分析的时候，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份国情报告，^①当时对人口问题的定义是，人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限制因素。1991年，我们进一步研究，提出人力资源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优势。这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包袱变成经济财富，而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来实现，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教育，就是如何普及全民教育；第二个是就业，就是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是市场化，就是要能够形成劳动力市场；第四个是人口控制，因为只有控制人口才能解决后面的就业问题。

①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胡鞍钢、王毅执笔，科学出版社，1989年。

很明显地,我们认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发展不平衡性是很突出的。在1950年,中国全国12岁以上人口的文化程度平均为1.5年,就是一年级半,因为当时我们有80%的文盲率。到了1990年,全国平均文化程度已经上升到5.5年,就是还不足小学毕业,尽管我们有许多硕士、博士,以及像我这样的博士后,但我们还有很多文盲人口。

从全国各地来看,教育水平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人口文化程度现在达到7.8年,快高中了。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就比较低了。像西藏,目前是1.8年,是全国最低的,跟整个内地的平均水平相差40多年;新疆还不错,达到4.3年,但也低于全国人均水平的5.5年。从总体上看,中国教育水平是在不断提高,但是表现出极不平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更不平衡。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就像西藏,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在全国倒数第11位,并不是最落后的,但是它们的文化发展水平,也就是教育水平,相对还是最落后的。所以,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读书班讲课时,对西藏自治区副书记巴桑说,西藏最大的区情,就是文化教育落后,因此要帮助西藏发展教育,教育处在最优先的位置。

后来,我在中央办公厅讲课的时候就讲到,中央现在向全国各省区筹集了30亿元,准备在西藏搞60多个项目。但是,其中恰恰没有基础教育的项目。当然,搞交通、运输、通讯等都是必要的。但是作为西藏这样的一个地区,它突出的问题是文化落后,应该加大投资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因为,少数民族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应该把解决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作为一个优先的、最重要的任务。这是因为中国的抚养系数目前比较低,1962年到1975年,是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现在大约有3.6亿的人。这一部分人已经进入受教育、就业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黄金时期,大规模地进行教育和培训或在职培训,就可能为下个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发展建立一支宏大的、质量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大军。这就是我们的观点。

问:您对将来中国经济起飞的论述,都建立在中国能够长治久安、国家不分裂、社会不解体的基础上,那么,您认为将来中国是否可能出现地方保

护主义，出现地方自治主义膨胀，诸侯经济膨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有多大，您有没有做出过预测？

还有，如何能够防止这种诸侯经济膨胀，这个是新加坡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

答：我们研究中国国情的基调，可称之为谨慎的乐观，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持谨慎态度，因为我们还遇到很多问题，包括您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诸侯经济”等。这不是将来发生的，其实目前已经发生了，而且相当尖锐。具体表现在，目前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诸侯经济”的特征的表现。

什么是诸侯经济呢？它不完全是历史含义上的诸侯，而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各类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知识、人才，不能够自由地流动和流出。譬如说，户口制就使我不能自由地去上海居住，也不能自由地去广州居住。或者说，我们现在的一些档案制都把人身自由绑得很紧。同时，各个省区自己的棉花不能外运，自己的粮食不能外运，等等。这都形成了很多的地方保护主义，恰恰破坏了我们的统一的市场。

如何解决呢？我们觉得还是得从制度上解决。我们提出了大体是“五个统一”。第一，市场必须是统一的，就像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任何一个州不能对另一个州进行课税。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禁止各州对其他州采取歧视的态度。第二，实行统一税制和统一税率，不能说深圳减免税，别的地方就高税，这就不行，要实行统一的税制，就像在夏威夷上岸的进口税和在纽约上岸的进口税，应该是等价的。所以，我就提出了“特区不特”的建议，发表在1994年10月份的《联合早报》上。最近，看到有关国务院特区办的一则消息，提出所有的优惠政策，将来都会取消。就是说，不能对一个省区优惠，因为这意味着对其他省区实际上是歧视，所以必须统一税制税率。第三，宏观调控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说我这里用宏观调控来紧缩货币的时候，你那边可以闯红灯、黄灯，那是不行的，就是要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利率政策、外贸政策，包括产业政策。第四，统一的再收入分配，如社会保障标准是应该统一的。第五，就是公共服务标准必须统一，譬如说全国各地修建铁道，宽度应该一样，不能有宽有窄。现在在云南，就有一条铁路是窄轨，那是法国人时期兴建的，我们到那里就得换火车，这就不行了。

所以必须统一服务标准,包括语言、文字、专利等。

问:您提到中国应该采取中国式的现代化,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当制度现代化,生产手段实现现代化,人类的劳动力越来越不需要的时候,人类社会会不会面临新的危机?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是在西方出现的问题,他们不是吃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工作的问题。当过去他们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高的时候,这些现代化导致的问题被掩盖住了。但是,现在当他们的市场占有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从您的数字看来,中国人民有12亿人口是农民,住在农村里面的大概是8亿多,假如中国也走向现代化,当农民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的时候,将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刚才您提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能不能跟我们提一下,到底中国对现代化的宏观设计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是否可以绕过西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答:我需要说明,现代化过程,不同的国家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特殊性。从共性来看,中国还需要经历一些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即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非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这是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为什么要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特殊,譬如新加坡的工业化就不存在这一很长的城市化过程,因为它本身的工业化就是城市化,这就是中国和新加坡在现代化方面的差异。如果和西方比较,中国的现代化也和他们有所差异,譬如美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上是土地不断扩展,农业生产力相当高,相当于中国的几十倍。它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后,就会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现在呢?大约不到5亿农村劳动力,将近有3亿固守在目前仅相当于美国耕地面积一半的这样一个耕地上。所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和美国不一样,譬如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就和美国一开始就从农业一下子转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不同于美国和西方国家之处。

今后看来,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不可能追求像美国那样的高消费方式,譬如人均小汽车占有量、人均住宅面积等,中国都

不能和美国看齐。恐怕中国更应该做的是要多搞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譬如在城市搞地铁、公共汽车等，来解决交通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将来的工业化模式、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应当不同于美国和西方。这样的—个资源节约型、适度消费型的发展模式，就是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个基本的长远设想。当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去研究和修正这个设想。因为这么一个大国，在它的经济起飞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破坏更加严重。怎么样才能在我们现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保证我们的生命支持系统，即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对这样的—个挑战进行研究并设法作出回答。

股份制应建立游戏规则^①

问：“十五大”已为大陆国企的股份制开了“绿灯”，您认为这一改革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什么？

答：任何一个改革方案都可能有多种结果。通常的情况是制订方案时其预期是最好的结果，而实际执行时却出现最坏的结果，即政策目标的“南辕北辙”。在目前制度不健全、缺乏游戏规则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国企改革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少数人以合法与非法的形式，透过权钱交易的途径，抢占与侵吞国有资产，免费瓜分全国人民（也包括农民）经过48年累积的巨额国有资产，以改革的名义、利用股份制改造来更大规模地腐败。除了少数人是赢家，12亿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输家。

问：您认为如何才能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呢？

答：谨防巨额国有资产沦为少数人的囊中物，关键是实行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政府应当在国有资产评估、出售、转让的信息和结果方面对人民有个“交代”，即这些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信息应当透明化、公开化，至少让老百姓知道要出售和转让的国有资产有多少？它的原值、净值是多少？市场价格现值是多少？这些出售后的国有资产的钱是不是回到国家财政？又有多少是用来支付社会保障、医疗费用，或者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为了避免股份制成为少数人“私有化”的专利品，这一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建立有效的制度，使被出售的国有资产成为不容任何吞食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并“用之于民”。每个公民都有权关心、了解

① 本文系作者接受美国《世界日报》（华文报）记者丘昭琪采访时的谈话整理稿，其摘要于1997年9月23日在该报发表。

这些资产是如何处置的，又是如何使用的。对此，国有资产管理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接受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和审查，必须制定透明的游戏规则。

问：您为什么不主张加速国企股份制改造？这又有哪些制约因素呢？

答：这一改革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所谓“一股就灵”，“一卖了之”。它受到两大因素制约：一是日益增大的下岗工人的出路问题。1996年底全国城镇有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富余人员 2 200 万，其中已下岗职工 900 多万人（据全国总工会统计已达 1 300 万职工下岗），加速股份制（包括集体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造，就会使剩下的 1 000 多万富余职工也要下岗。让大量现岗职工及其家庭单独来承担股份制改革的代价，一是缺乏效率，约 2 000 多万劳动力资源被闲置浪费；二是不公平，大量职工面临“失业失去一切”的生存威胁；三是不稳定，会出现大规模的静坐、请愿和游行事件，导致社会不稳定；四是庞大的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据统计，1995 年底全国城镇居民职工达 3 094 万人，其中国有单位 2 401 万人，退休费用达 922 亿元，大部分是由所在企业和单位支付的。目前被停、减发离退休金的人员已达 227 万人，成为继“下岗职工”之后的中国第二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上述条件制约下，任何一个聪明的真正了解实际情况的决策者都不会冒冒失失地实行“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改革。我认为，朱镕基副总理最近在“十五大”对股份制改革吹点“冷风”是明智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是他能不能抵得住全党的“股份化之风”，还很难说。因为中国始终没有摆脱运用传统的“政治运动”手段搞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习惯和机制。

问：那么中国大陆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答：应当把降低城镇真实高失业率作为今后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当中国于 1996 年首次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大幅度降低高通胀，并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之后，城镇失业问题上升为最主要的问题，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为 3.0%，但加上下岗职工后，实际失业率达 7.5%，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其次尽快建立全社会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各自为战”、“五龙治水”的分割局面，实行和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中国的改革是世界上